

近代中国海权思想浅析

高 月

提要:马汉的海权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在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独立产生了自己的海权思想。近代中国海权思想具有本土防御的特质。马汉的海权思想传入中国后,其中的一部分与中国传统海权思想结合,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传统海权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传统海权思想中的自卫防御特质仍然得到保留。

关键词: 海权思想 马汉 海权论 本土防御

作者高月,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华 321004)

引 言

论及海权思想,最为耳熟能详的是美国人马汉所著《海权论》一书。该书于1890年问世,是西方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之作,因迎合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需求,被奉为圭臬。该书改变了美、德、日等国的海洋和海军发展战略,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各国对于海权的认知。马汉的海权理论尤其是其对于海权概念的界定,依然是当今各国探讨海权的标尺和预设前提。这种垄断性的影响力在我国相关学术领域的体现是马汉海权理论这一外部的、单一的视角已成为我国海权研究的绝对主流。以本文的研究对象近代中国海权思想为例,这一领域虽向为学界关注,成果颇丰,但综合来看,现有成果大多以马汉的海权思想为视角展开论述,无意间忽略了中国自身固有的产生海权思想的土壤,论点也难免失之偏颇。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中国历史着眼探讨近代中国海权思想,以近代舆论俯拾皆是的相关海权思想的表述为基础史料,沿着以下思路展开,即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有无海权思想,如果有,其导源何处?马汉的《海权论》既然能够对各帝国主义强国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它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的海权思想有何种影响?

一、近代中国有无海权思想

关于近代中国海权思想的有无,目前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后林则

徐、魏源等人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海权思想；^①另一种观点认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官民各界才开始产生海权思想。^②综合来看，前一种观点虽有“从中国发现历史”之意，但其研判近代中国海权思想有无的标尺却来自美国人马汉所著《海权论》中的广义海权概念。马汉的海权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海权“涉及了促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③。这种广而化之的概念给前一种论点极大的施展空间，以此为基础，部分论述将一些近代人物的有关海洋的思想均装进这个概念，以为论据。后一种观点与此有相似之处，即其研判标准同样来自马汉的海权概念，只不过依据的是狭义的海权概念。在《海权论》中，狭义的海权概念是海上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的结合。部分论者以此“精确”的概念比量近代中国，认为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只知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完全没有海洋作为经济贸易途径、军事上的战略基地的观念。

应该说，双方观点如果孤立地来看，虽有各说各话之嫌，但也均能成一家之言。之所以产生分歧，聚讼不休，根本原因是双方标准不一。笔者认为，笼统地将近代中国海权思想放诸西方的近代意义的概念，或者削足适履去迎合这个概念，均不可取。探讨近代中国海权思想，应注意中外之分、古今之别。

目前被中国学者广泛应用的马汉的海权理论是西方历史实践的产物。首先，《海权论》是海上战争历史的产物。《海权论》在梳理西方海战史的基础上，认为海权对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要夺取海权，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一理论与古代地中海沿岸的战争史互为印证。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沿岸国家的海权实践创造了条件。希波战争突显了海军的重要作用和海权对于陆权的优势。罗马创建了强大海军，摧毁了迦太基海军，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凭借海上力量的优势，攻击汉尼拔的后方补给线，使其前后不能兼顾，又赢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其次，《海权论》是西方海上贸易发展的产物。地中海文明的历史表明，海上贸易与海上军事力量相伴而生，商业繁荣与海上霸权相辅相成。《海权论》的基本逻辑链条是：通过强大海军获得制海权——控制海洋通道——控制海洋贸易并从中获得巨额财富——财富反哺海军建设并最终获得世界霸权。海军保障国家财富的积累，财富又促进了海军的强大，两者形成良性互动。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从古希腊到19世纪各帝国主义国家再到当代美国的历史反复证明。

应该说，《海权论》作为一种战略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是对西方国家历史上海上军事力量与海洋贸易之间伴生关系的提炼与总结。但如将其用于衡量近代中国有无海权及海权思想，则应慎重。首先，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西方不同。在西方国家将海洋作为贸易通道的时候，海洋在中国历史上却完全是另一种角色，它一方面是陆疆安全的屏障，另一方面是“他者”远来甚至进犯的通道。在经历了南宋时期盛极一时的海洋贸易之后，海洋的历史面相大多数情况下仍是防御的对象，而非利源之所出。即使中国有过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也只是朝贡体系下明王朝振国威、施远恩的“自娱自乐”而已。虽然通过赏赐与朝贡实现了中外商品交换，具有朝贡贸易的性质，但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经济上的贸易意义。既然谈不上海上贸易，其船队中庞大的海军当然也就不具备保护海上贸易功能。这与西方国家海军与贸易并举的海权概念完全相左。其次，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基础与

① 此类观点较具代表性的论述有：卢建一《从东南水师看明清时期海权意识的发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的海权思想》（《求索》1996年第2期）、缪凤林《三代海权考证》（《史地学报》1921年第1期）、李强华《晚清海权意识的感性觉醒与理性匮乏——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② 此类观点较具代表性的论述有：周益锋《海权论的传入和晚清海权思想》（《唐都学刊》2005年第4期）、《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刘一健、吕贤臣《试论海权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③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范利鸿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西方不同。西方海洋文明是外向文明,崇尚进取与冒险;中国由儒家文化主导的生活伦理则是内敛的,重义而轻利。另外,中国陆疆面积广阔,物产富饶,大部分地域以小农经济为主导,不需要与大洋彼岸的国家进行交换即可自给自足。同时,小农经济也不足以支撑一致庞大的远洋海军,因此以海军扩张为原动力的西方近代海权就不可能与中国产生任何共鸣。关于这一点,先贤学者曾有过精致的分析。严复曾指出:“中国者,正海、陆兼控之国也。徒以神州舆壤,地处温带上腴,民生其中,不俟冒险探新,而生计已足,此所以历代君民皆舍海而注意于陆。”^①

综上,究竟应该据何标准讨论中国近代海权思想,是用马汉之海权论反观中国历史,还是以中国自身为落脚点,研判中国人长期与海洋接触尤其是近代以来与外部世界交往、冲突过程中形成的有关防控海洋、经营海洋的认识?笔者认为,后者显然更具合理性。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数次由海洋而来的边疆危机后,朝野对海洋之地位、作用及如何防海、制海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应在情理之中。

近代西方的海权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如果不加区别地将马汉海权概念用于中国,进行穿越时空的比附,其结果只能是阻碍对中国海权及海权思想的梳理。目前学界俯拾皆是的海权概念,很有可能只是“一种过分耳熟能详的迷思罢了”^②。中国海权思想的内涵及其发展脉络,需要从中国历史中探寻。

二、近代中国海权思想导源

笔者认为,中国海权思想的产生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海洋由天堑变为通道,海洋不再具有不可逾越性;二是对陆疆安全造成威胁的势力从海洋而来。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中国人才会产生控制海洋、防御海洋、经略海洋的思想,即中国的海权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与海洋上的他者发生对抗应始自明代的抗倭。^③正如刊刻于明末天启元年的《武备志》“海防”部分所言:“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④

零星的倭寇扰民事件自明初在东南沿海即时有发生,由于明朝政策失当,至嘉靖年间遂演变为大规模的倭患。^⑤在现实的激发下,明朝的海防思想也在此时勃兴。其中,影响最著者当属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该书完全以防倭、制海为着眼点,是官方对于倭患的反应,即如作者所言:“壬子以来,倭之变极矣……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迹……而记载蔑如,无所从得……咸以为恨……曾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恨今也。”^⑥该书共十三卷,卷一为海防图,“综合明中期因抗倭而聚积的海防资料成果”^⑦。卷二是对中日关系及日本国情的梳理。卷三至卷七为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和辽阳的沿海形势。卷八至卷十记录了嘉靖年间的倭患情况。卷十一至卷十三是作者对防倭、制海的战略思考。从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该书可谓明中期以后倭患催生的海防论著的滥觞,对此后两百余年的同类论著有着持续的影响”^⑧。

《筹海图编》以降,有关海防的论著大量出现。万历二十年(1592),总督两广军务的萧彦命邓钟在

① 王栻:《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57页。

② 罗志田认为学界目前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虽耳熟能详,但仅是一种“迷思”(参见罗志田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于海权的研究与此有相似性。

③ 汉、唐、元诸朝虽都曾有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但此时的海洋仅是作为军事运输的媒介,而非战争的主角,因此不能产生任何与海洋防御相关的思想。

④ 茅元仪:《武备志》卷209,载《四库禁燬书丛刊》,子部第2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

⑤ 戴裔煊:《明代嘉隆年间倭寇海盜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7页。

⑥ 郑若增:《筹海图编》,载《中国兵书集成》(第15—16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0年,第27—28页。

⑦ 张伟国:《明清时期长卷式沿海地图述论》,李金强、刘义章、麦幼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第3页。转引自李恭忠、李霞:《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变——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

⑧ 李恭忠、李霞:《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变——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

《筹海图编》基础上删繁留简,添以续闻,重编成书,名为《筹海重编》,以应对日本侵犯朝鲜后的海防危机。万历二十四年(1596),浙江温处兵备兼巡浙东道副使蔡逢时编纂《温处海防图略》,以重浙东海防。万历三十年(1602),浙江按察使司管海兵备道范涑编纂《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万历四十一年(1613),湖广学政王在晋编成《海防纂要》。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编纂《武备志》,其中“海防”部分亦取自《筹海图编》。这些著作均以从海洋而来、对王朝统治构成威胁的倭寇为防御对象,具有强烈的外部取向,明显不同于明朝以前历代对海洋的认识。

无论倭寇的成分如何,本质上是从海洋而来的并严重威胁到明朝陆疆安全的海上势力。倭寇催生了明代朝野关于抗倭、防海的思考,这些思考汇集成的海防思想是中国海权思想的发端,也是中国海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清代。

清前、中期,一批海防论著相继面世,主要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輿记要》、杜臻的《海防述略》、姜宸英的《海防总论》、韩奕的《防海集要》、薛传源的《防海备览》、严如煜的《洋防辑要》、俞昌会的《防海集要》。据当代学者考证,清前中期海防论著深受郑若曾《筹海图编》影响,继承了其以倭寇为防御对象的整体思路。这些著作所体现的海防思想亦与《筹海图编》如出一辙,甚至个别句段与《筹海图编》一字不差,大多是对明朝海防的回顾与总结。^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倭寇在有明一代确实给中国东南沿海造成巨大威胁,官僚学者形成长久挥之不去的倭寇记忆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清朝前、中期海防相对平静,在影响更剧的敌人出现以前,倭和寇仍然是防御的重点。舆地之学的兴衰完全取决于现实形势。清朝前、中期边患主要来自于“三北”,东南沿海在收复台湾后陆续弛禁。当时的士大夫感知不到大洋彼岸的世界,更无法预见比倭寇更为陌生的他者,其研究视域只能投向前代和倭寇。但这种情况被鸦片战争改变。

鸦片战争使部分官僚和士大夫意识到传统海防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他们的海防思想较诸明代发生了明显变化。

其一,防御的对象由倭寇向西洋诸国的转变带动了防御手段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历次对外战争的敌人主要是来自海上的西洋诸国,其实力和侵略意图完全不同于倭寇。对手的变化催生了海防思想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将近代海军作为防御手段方面。

林则徐、魏源最早提出建立西式的近代海军用以防御列强从海上的入侵。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即主张从固守海岸向舰船主动出击转变,认为“剿夷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②。魏源主张“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驾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③。林、魏建设海军的主张被其后的左宗棠、丁日昌、李鸿章等继承。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奏称:“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④同治七年(1868),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彼此呼应,连成一气。^⑤李鸿章作为清末海防派的代表,对于近代海军的推崇自不待言。他强调建设海军用于近海防御,主张:“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⑥这些人之所以大倡海军,根本原因是他们意识到海洋防御的对象已发生改变,不能再以盗、寇视之,防御手段必须也随之改变,如吴大澂所言:“昔之防海,专恃陆军布置在海口以内;今之防

① 李恭忠、李霞:《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变——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

② 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③ 魏源:《魏源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870页。

④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页。

⑤ 宝璜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⑥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海,宜大治水师经营在海口以外。”^①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清王朝在甲午海战以前完成了西式海军的创建。

其二,海防的地位得到提升。阿古柏入侵新疆和日本侵犯台湾引发的陆防与海防之争是海防地位得到提升的明显例证。在此之前,陆防一直是清王朝防御的重点。陆防与海防无论孰优孰劣,这场争论本身即足以说明经过鸦片战争后几十年的发展,在海疆危机的刺激下,海防已不再从属于陆防。就国家整体安全而言,海防已变得同陆防同等重要。除李鸿章以外,海防论在当时得到了两江总督李经羲、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闽浙总督李鹤年以及沿海省份地方官员的赞成。在这些人的鼓吹下,海防成为清王朝生死之所系,正如李鸿章所言:“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②

综上,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明显由明代传承而来,但鸦片战争以后,无论是对海防手段还是对海防地位的认知,清代海防思想均表现出明代所没有的特点。另外,明清以海防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海权思想,是对外部冲击的本能反应,海岸防御、近海防御是其最大特点,是自卫型的海权思想,这与清末传入中国的马汉的进攻性海权思想明显不同。这再一次印证了在马汉的海权思想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完全有可能演化出自己的海权思想。

三、马汉《海权论》对近代中国海权思想的影响

据当代学者考证,马汉的海权理论最早于1900年由日本人主办的刊物传到中国。1900年3月,由日本人主办在上海发行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翻译马汉《海权论》,取名为《海上权力要素论》,但该刊只翻译了《海权论》的第一章第一节。^③此后,《游学译编》、《国风报》等报刊也在清末零星翻译过西方海权论著。尽管如此,西方海权理论毕竟由此进入中国,并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传统海权思想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海权”概念开始出现在国人有关海权思想的表述中。此时的“海权”概念包含几种含义。其一,海权即海军。这种理解比较普遍。如《英俄法之海权》一文将英俄法各国海军战舰之多寡作为衡量海权大小之标准,认为海权即“海上制胜之权”,将海权理解为军事意义上的海军。^④《竞争海权》一文认为各国海权之竞争即海军之竞争。^⑤《欧美列国之海军扩张》一文主张:“欲伸国力于世界者,必先争海上权,而海上权力之消长,即以海军之强弱以为差定。”这明显是将海权等同于海军,但该文结尾的表述却显示出作者对海权的另一种理解。作者称:“然试问二十世纪中各海军国竞争之目的物,非太平洋海权乎?”^⑥此处作者显然是将海权理解为海洋的控制权。同一篇文章中海权的含义前后不一,体现出当时海权概念的混乱。有人将国家间的海权斗争理解为海军的竞争,认为海军实力占优的国家自然会赢得海权。^⑦《海洋空间与海权》一文持相似观点,其在行文中称:“这次战争的结果,更证明日本海军的力量只够欺侮东方没有海军的国家,而不够抵挡西方的真正海权。”^⑧这显然是将海军与海权对等。

① 张侠:《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② 《海防要览》卷下,载《中国兵书集成》第48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3年,第238页。

③ 周益锋:《“海权论”的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④ 《英俄法之海权》,《清议报》1900年第65期。

⑤ 《竞争海权》,《经济丛编》1902年第19期。

⑥ 《欧美列国之海军扩张》,《江苏》1903年第2期。

⑦ 《英美日海权斗争的观察》,《警灯》1934年第1期。

⑧ 《海洋空间与海权》,《时与潮半月刊》,1948年第2期。

其二,海权即制海权。1907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附近中国海域,报刊舆论在对此事件的报道中多引入海权概念,但对海权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如《葡人以澳门至湾仔为占有之海权耶》一文称:“贵国官如此办法,不独显违合约,抑且侵损本国之权限”^①,将海权理解为制海权,抑或是对海洋的管辖权。但此后报道该事件的文章则又将海权理解为领海。如《查报葡人占越海权之证据》一文称:“湾仔为香山门户,即海面亦中国轮船常经之处。葡人竟视为固有,实属意存占越。”^②《力争海权》一文称:“澳门葡兵此次擅行越界,迫令中国渔船改泊澳门,并称该处海权全归葡国管辖,实属有违约章。”^③这与上文提到的海权概念混乱的情况类似,对同一事件的报道,虽然均以海权为题,但指称完全不同。将海权理解为制海权在当时比较普遍,如有人称:“英人鹰瞵虎视,夺我之海权,尤不肯落诸国后,占我香港、九龙,而南洋之海权失;租我威海卫、秦皇岛,而北洋之海权失;覬觎我舟山,保护我吴淞口,而南北洋适中之海权失。”^④《海权世界与空权世界》一文称:“海权国家争霸海上,即必控制这海洋交通的咽喉门户。”^⑤《海权争持中的达达尼尔海峡》一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之胜利,它的关键,系在大西洋获得制海权。”^⑥从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它们多是从字面上将海权理解为制海权,对概念的应用重于对概念的理解。

其三,海权即领海。将海权理解为领海的文章除以上提到的两篇外,较具代表性的当属《三代海权考证》一文。该文称:“海权诚升降靡定,然即其有某海海权时,亦非全海皆入范围”,考证出“商之海权,东北远逾于南”。可见,该文所言之海权即王朝所管辖之海域,即领海。^⑦

其四,海权即海洋经营权,抑或海洋权益。《比较英国海权》一文将商船之多寡作为衡量一国海权大小的标准,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海权以英国为雄,沿至今日,天下海权英国占其过半。试将去年各国商船之数列为表,即可见矣。”^⑧与此类似,《太平洋上美日海权之新竞争》一文认为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权竞争就是对太平洋上海运权的竞争,亦是商业经营的角度理解海权。^⑨此外,尚有部分文章将渔权等同于海权,或认为渔权是海洋权益的一部分。如《北海部应付日本侵占海权》一文称:“此次日舰驶入龙口、芙蓉、日照等岛,侵害中国数百万渔业生产,剥夺吾国一万余里海权。”^⑩《日本侵我领海渔业》称:“我国岂可将大好渔业权,拱手断送于外人。用敢请我中央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力争主权;更望全国同胞奋起力争,不达收回海权之目的不休。”^⑪《渔夫 海贼 海权》一文将渔权看作是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称:“我们的渔业,要是被人侵害了,那个损失,就不单在渔权上,那是要连海权一块要丧失的。”^⑫《确保海权完整》一文与此类似,称:“日本渔船近来迭次侵入我国领海……此事不但渔业界受到的损失很大,而且也影响到我国的海权完整。”^⑬

从以上国人对海权概念的应用可见,正是由于海权论传入中国的不系统性,国人对“海权”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或需要,择取马汉“海权”概念的一部分,用于各自的文章中。

其次,有部分论述在马汉海权思想的影响下,注意到了西方海权框架下军事力量与商业之间的连

① 《葡人以澳门至湾仔为占有之海权耶》,《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年第22期。

② 《查报葡人占越海权之证据》,《孔圣会星期报》1910年第104期。

③ 《力争海权》,《外交报》1907年第19期。

④ 《世界之海军观》,《北洋兵事杂志》1910年第1期。

⑤ 《海权世界与空权世界》,《新中华》1945年第2期。

⑥ 《海权争持中的达达尼尔海峡》,《智慧半月刊》1947年第15期。

⑦ 《三代海权考证》,《史地学报》1921年第1期。

⑧ 《比较英国海权》,《知新报》1899年第95期。

⑨ 《太平洋上美日海权之新竞争》,《银行周报》1926年第17期。

⑩ 《北海部应付日本侵占海权》,《兴华》1924年第26期。

⑪ 《日本侵我领海渔业》,《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27期。

⑫ 《渔夫 海贼 海权》,《四海》1932年第17期。

⑬ 《确保海权完整》,《自由天地》1948年第8期。

带关系。如《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认为：“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①“海军者，所以保护旅外之国民，保护殖民地，保护商业，保护商船也。”^②因该文主要材料来自日本报刊，所以其对海权的理解更接近马汉的海权概念。《巴拿马运河与海权问题》虽是译文，但译者在文首和文末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今日之世界，兵战固战也，商战亦战也。兵战固烈，而商战有时更烈于兵。兵战而败，其转败为胜也犹易；商战而败，其转败为胜也实难。”“禹域万里，以此而供人商战兵战之场，其必致惨苦愈惨苦，剧烈愈剧烈。”^③该文注意到了海上贸易和商业上的逐利才是各国争夺海权的实质，同时以弱国心态分析大国海权格局变动下的中国形势，应该说对西方海权思想的强权本质有所察觉。

不惟如此，清朝和民国官方受西方海权思想影响，也对海军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光绪二十八年（1902）政务处曾奏称：“经营海军实为立国之要，平时巡阅洋面，保护商税，既足以开通风气，亦足以自卫藩篱。”^④1934年，民国政府交通部曾派员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海权问题，认为：“与航业关系最大者，阙为海权。英美各国之航线，能如是发展，商业能如是发达者，皆赖海权为扩张之后盾。”“一国商业之多寡，不仅关系商业之盛衰，实系乎一国之强弱。商业藉商轮资以运输，商轮复藉军舰资以保护。至作战时，军舰亦可藉商轮之臂助。”^⑤实际上，这一论点基本体现了马汉海权论的理论逻辑，即军力与商业互为补充，共同繁荣，最终实现对他国的优势。

基于对军事力量与商业之间关系的认识，部分论述对清末重建海军进行了反思。如《书劝输海军捐启后》一文称：“英国海军最盛，但其宗旨在于保商……我华之商务，非其比者。”“今日振兴中国之要素，当务之急实有多端。若不思先务之急，而先谋整顿海军以壮外观，试问中国海军成立之后，其于海军国之位次，将居何等乎？……掷黄金于虚牝，好事者为之，有识者惜之。”^⑥《吾有望于海军处者一》一文称：“北洋舰队全没，今虽计画复兴，然就我目下之国力观之，非自贬之论，亦不过先谋自卫而已矣。”“即使舰队编成，其价值亦不过如甲午战前之北洋舰队而已。”^⑦《论政府将复设海军》一文针对“上自政府，下至士大夫”“以为海军一经复设，则萎者可使之立起，死者可使之复生”的想法，认为中国受经费、人才、军舰等方面制约，不具备重建海军的条件。^⑧以上诸文注意到了海军是国力的体现，与一国商业之发达成正比；如无发达之商业，海军实无存在必要。这实际上是用马汉的海权思想分析中国的现实。

与国人对海权概念的理解不一致相类似，对于海军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及建立海军的必要性，有人从反方向进行了解读。如当时有人认为：“今兹之中国，仅能扩张陆军而不辅以海军，恐海权渐失，而国权以之替矣。保护不及，而商力以之微矣。”“有海权之国强，无海权之国弱；得海权之利者国富，失海权之利者国贫。”^⑨《劝输海军捐启》则在分析了中国较诸欧美列国的劣势之后，认为：“海军不兴，其受祸害如此，海军一兴，占优胜如彼”，进而主张中国“人人当知海军为当今第一之要务”^⑩。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先有强大的海军，然后才能商业繁盛，国力增强。

如上文所述，马汉海权思想的理论逻辑呈现环状结构，海军和商业之间无分先后。以上两方论者

① 《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新民丛报》第26号。

② 《巴拿马运河与海权问题》，《国风报》1911年第12期。

③ 《政务处奏覆前护江督李奏海军孱弱宜振兴以维商务折》，《浙江交傲报》1903年第13期。

④ 《交通部派员演讲航线与海权》，《交通杂志》1934年第2、3期合刊。

⑤ 《书劝输海军捐启后》，《通学报》1906年第14期。

⑥ 《吾有望于海军处者一》，《武学》1910年第14期。

⑦ 《论政府将复设海军》，《东方杂志》1908年第4期。

⑧ 《筹复海军议》，《南洋兵事杂志》1909年第38期。

⑨ 《劝输海军捐启》，《醒狮》1906年第5期。

各自从这个环状结构中截取一段,以为理论基础,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论从哪个方向解读,双方均能自圆其说,其立论的基础实际上都是马汉的海权思想,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最后,尽管“海权”充斥于近代中国的报刊舆论,但此“海权”非彼“海权”,马汉海权理论的扩张性和其具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强权特质并未在中国落地生根,即便是主张大力建设海军的文章,目的也仅是近海防御和本土防御。如《筹复海军议》虽极力主张建设海军,但在文章末尾,其作者道出了建设海军的目的,称:“目前就可辟之军港,与现有之船舰,从速兴筑,酌量增配,期于五年内编成海口巡防舰队及长江舰队”,即主张近海防御和内河防御。^①由留日学生于1909年在东京创办的《海军》季刊以鼓吹建设海军闻名,其第一期登载的《重兴海军问题》一文在总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次对外战争失败的教训后,认为中国应建立强大海军,但其建立海军的目的仅是海岸防御。该文作者称:“夫用兵者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今海岸线至四千英里之长,而无一有力舰队以任防御。”“欧风美雨,挟印度洋、太平洋之潮流,滚滚而来。吾沿海七省根据重要之地,乃在顾此失彼,凤鹤惊心。”^②不惟舆论如此,清政府官方虽大倡重建海军,但其着眼点仍是沿海防御,如姚锡光在《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中所言:“我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③言下之意,建设海军的目的仍是防卫沿海省份。

结 语

综上所述,马汉的海权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但它对近代中国海权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独立产生了自己的海权思想。中国海权思想滥觞于明代发端的海防思想,其后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如同西方战争史是马汉海权论产生的思想土壤一样,中国沿海防御的历史尤其是威胁到王朝统治基础的海疆危机是近代中国海权思想产生的基础,由此也决定了其不同于马汉海权思想的本土防御的特质。马汉的海权思想传入中国后,其概念和部分理论逻辑关系与中国传统海权思想结合,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传统海权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传统海权思想中的自卫防御特质仍然得到保留,这是近代中国海权思想的最大特点。我们不能忽视外界思想传入对其的影响,但也不能夸大这种影响。

责任编辑:徐吉军

① 《筹复海军议》,《南洋兵事杂志》1909年第38期。

② 《重兴海军问题》,《海军》1909年第1期。

③ 张侠:《清末海军史料》(下),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800页。

作者：[高月](#)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 金华 321004](#)
刊名：[浙江学刊](#)[PKU](#)[CSSCI](#)
英文刊名：[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2013(6)

参考文献(56条)

1. [卢建一](#) [从东南水师看明清时期海权意识的发展](#) 2003(01)
2. [戚其章](#) [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的海权思想](#) 1996(02)
3. [缪凤林](#) [三代海权考证](#) 1921(01)
4. [李强华](#) [晚晴海权意识的感性觉醒与理性匮乏——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2011(04)
5. [周益锋](#) [海权论的传人和晚晴海权思想](#) 2005(04)
6. [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 2006(04)
7. [刘一健](#); [吕贤臣](#) [试论海权的历史发展规律](#) 2007(02)
8.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范利鸿](#) [海权论](#) 2007
9. [王枬](#) [《严复集》第二册](#) 1986
10. [罗志田](#)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 1998
11. [汉、唐、元诸朝虽都曾有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但此时的海洋仅是作为军事运输的媒介,而非战争的主角,因此不能产生任何与海洋防御相关的思想](#)
12. [茅元仪](#) [《武备志》卷209](#) 2000
13. [戴裔煊](#) [明代嘉隆年间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1982
14. [郑若增](#) [筹海图编](#) 1990
15. [张伟国](#) [明清时期长卷式沿海地图述论](#) 1999
16. [李恭忠](#); [李霞](#)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变——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2007(03)
17. [李恭忠](#); [李霞](#)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变——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2007(03)
18. [李恭忠](#); [李霞](#)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变——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2007(03)
19. [杨国桢](#) [林则徐书简](#) 1981
20. [魏源](#) [《魏源集》\(下\)](#) 1983
21.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五\)](#) 1961
22. [宝望](#)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 1979
2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 1980
24. [张侠](#) [《清末海军史料》\(上\)](#) 1982
25. [《海防要览》卷下](#) 1993
26. [周益锋](#) [“海权论”的东渐及其影响](#) 2006(04)
27. [英俄法之海权](#) 1900(65)
28. [竞争海权](#) 1902(19)
29. [欧美列国之海军扩张](#) 1903(02)
30. [英美日海权斗争的观察](#) 1934(01)
31. [海洋空间与海权](#) 1948(02)
32. [葡人以澳门至湾仔为占有之海权耶](#) 1907(22)
33. [查报葡人占越海权之证据](#) 1910(104)
34. [力争海权](#) 1907(19)
35. [世界之海军观](#) 1910(01)
36. [海权世界与空权世界](#) 1945(02)

37. [海权争持中的达达尼尔海峡](#) 1947 (15)

38. [三代海权考证](#) 1921 (01)

39. [比较英国海权](#) 1899 (95)

40. [太平洋上美日海权之新竞争](#) 1926 (17)

41. [北海部应付日本侵占海权](#) 1924 (26)

42. [日本侵我领海渔业](#)

43. [渔夫海贼海权](#) 1932 (17)

44. [确保海权完整](#) 1948 (08)

45. [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

46. [巴拿马运河与海权问题](#) 1911 (12)

47. [政务处奏覆前护江督李奏海军孱弱急宜振兴以维商务折](#) 1903 (13)

48. [交通部派员演讲航线与海权](#) 1934 (2, 3)

49. [书劝输海军捐启后](#) 1906 (14)

50. [吾有望于海军处者一](#) 1910 (14)

51. [论政府将复设海军](#) 1908 (04)

52. [筹复海军议](#) 1909 (38)

53. [劝输海军捐启](#) 1906 (05)

54. [筹复海军议](#) 1909 (38)

55. [重兴海军问题](#) 1909 (01)

56. [张侠 《清末海军史料》（下）](#) 1982

引用本文格式：[高月](#) [近代中国海权思想浅析](#)[期刊论文]-[浙江学刊](#) 2013 (6)